

## “空间”概念与近代北京城市史研究

□ 王建伟

**摘要:** 在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史研究中,“空间”曾被视为是一个单纯承载使用功能的地理场所,或者一种纯粹的客观存在。但随着近几十年来众多学科方法的交汇与融合,尤其是列斐伏尔、福柯、哈维等人的相关理论贡献与冲击,“空间”被赋予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内涵,成为一个带有复合意义的概念。在近代北京城市史研究中引入“空间”维度,可以进一步丰富研究方法,转换研究视角,从而实现研究疆域的拓展与理论性的提升。

**关键词:** 空间;近代北京;城市史

**中图分类号:** K2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402(2018)02-0088-09

从当前国内城市史研究的趋势观察,地理环境、历史沿革、管理体制、商业网络、文化消费以及市民生活等仍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空间”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或阐释方式,试图从“空间维度”考察有关城市的多个面相,探讨城市空间变革背后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动因,关注特定空间内部的社会关系与等级秩序变化,尤其关注“权力”因素在空间重构中的运作痕迹。此处的“权力”涵盖了更多的内容,既包括政治权力,也包括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权力(如商业资本)与市政技术等。相对于以往那些显性的对象,现在的研究者越来越关注那些城市发展进程中不能被轻易看到的隐性因素。“空间思维之于历史研究,关键在于研究的设计之中,是否能把空间结构看作权利以及资源关系的产物,把空间形态解读成具有社会文化经济意义的历史积淀。”<sup>①</sup>可以说,“空间维度”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已经基本成型,在城市史研究中的地位逐渐被确立,并表现出越来越蓬勃的趋向。应用“空间”概念解读近代北京城的历史,可以提供更加广阔而多元的观察视野,从而丰富我们对城市变迁的许多认知。

### 一、近代北京城市空间研究的学术史梳理

作为文明发展的产物,城市首先是以空间形态展现在众人面前。每座城市都有特定的空间结构,有的依傍于宫殿与寺庙,有的依傍于官僚衙署,有的依傍于水系与码头、有的依傍于铁路。长期作为“帝都”的北京有着与其城市身份相匹配的空间结构,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

作者简介:王建伟,男,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sup>①</sup>叶文心《空间思维与民国史研究》,《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已经开始,侯仁之是最早的开拓者与奠基者,他对于北京河湖水系、城址起源、城市规划与建设等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北京历史地理的学科理论框架。在侯仁之的北京研究中,“空间”思维一直贯穿其中,对后来者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sup>①</sup>七十年代,美国学者施坚雅主持编写了《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这部论著从历史、空间和社会三个不同角度对明清两朝的城市展开论述,其中关涉北京的篇章有《清初的行会》《中国城市的宇宙观》等。由施坚雅本人完成的《清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以清代北京为分析对象,依据19世纪中期出版的《乾隆京城全图》等为主要材料,提出了“城市生态学”理论。这种理论假设明清时期的北京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空间,即由士绅和商人分别组成的居住及社交中心。在这两个空间内部,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空间分布差别并不明显,而且不同类型的空间分布或者说北京的社会空间结构具有非常强的稳定性。<sup>②</sup>

虽然后来也有学者如贝尔斯基在《再探讨帝国晚期北京的“城市生态”:中华帝都社会空间的转变》中对施坚雅提出的“城市生态学”理论进行了质疑与反思,但并没有跳脱出这套理论体系,只是在其适用的历史阶段以及具体的地理位置方面对其进行了修正。近年来,随着一些地理信息系统在近代北京城市史研究中被引入,已经可以对人口、区位以及商铺、学校等进行更加精确的数据分析,实际结果是进一步弥补了施坚雅等一些前辈学者结论的缺失与不足,但所有的分析与解释仍然基本维持在这一概念的理论框架之内。

城市形态、功能与其空间结构密切相关。章英华是从“社会区位”(social ecological)理论分析20世纪初(时段基本限定在1900—1935年)北京内部结构变动的代表者。这一理论围绕两个主题,一方面是土地利用的功能区分,另一方面是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户的居住配置。关于前者,他讨论了宫殿和衙署的配置以及工商土地利用两部分。关于后者,他讨论了职业人口、族别人口、贫民以及一些相关的人口资料。通过相对详细的数据分析比对,章英华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即从整体看来,由于官吏、工商业者、无技术劳动等的低隔离状态,使得北京虽有内外城的行政和商业的对比,但并未显示明显的阶层隔离现象。<sup>③</sup>

近代北京的空间秩序经历了复杂而深刻的巨大变化。史明正较早开始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他从城墙、中轴线和建筑三个方面探讨了清末民初北京内部空间的演变特征及其意义。作者提出,20世纪初北京城市空间秩序的改变,主要体现在古代帝都以宫殿庙宇为中心的标志性建筑和街区的衰微,代表新型资本主义工商业文化的西式建筑和街区的兴起。虽然这种变化比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规模较小,但其变化的脉络还是清晰可辨的。作为个案,史明正详细考察了北京传统的皇家御园转变为向市民开放的现代公园的历史过程,并探讨了官方市政机构以及地方绅士、商人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有关近代北京城市变革的专著中,“空间结构”也是非常重要的论题。<sup>④</sup>

1997年,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系的王均在导师侯仁之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近代北京城内部空间结构的历史地理研究》,该文以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为主要理论方法,对近代北京城的社会变革及其导致的内部空间结构变化做出了描述及阐释。2015年,孙冬虎在此博士论文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内容,扩张篇幅近两倍,与王均联合署名,以《民国北京(北平)城市形态与功能演变》为题出版。文中提出,清末民初的北京城逐步失去了在全国城市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但在西方因素的影响下,城市内部

① 相关代表性文章主要收入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北京城的生命印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② [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③ 章英华《二十世纪初北京的内部结构》,台北《新史学》(创刊号),1990年3月。

④ [美]史明正《从御花园到公园——20世纪初北京城市空间的变迁》,《城市史研究》第23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清末民初北京城市空间演变之解读》,《城市史研究》第21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出现了市政技术、市政组织、工商实业、社会结构等多方面的新变化,由此带动了空间结构的变化。在城市格局方面,以帝王宫殿为中心的空间结构转变为以商业服务地段为中心的功能空间结构。在社会空间结构方面,主导调控因子由封建时代的身份等级转变为家庭经济状况。总体而言,地租、地价因素与城市规划管理因素共同引导着城市内部土地利用方式及功能区配置格局的变化。本书利用各种数据资料,对近代北京空间结构演变的动因及特征进行了宏观概括,虽然脱胎于20年前的旧作,但其核心观点仍然具有相当的说服力。<sup>①</sup>

董玥的《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是其2003年出版的英文著作 *Republican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 的中文版,书中涉及民国北京的诸多重要面相,对一些理论问题的精彩呈现使得本书成为21世纪以来民国北京研究的典范著作。空间秩序的转变是董玥重点论述的问题,她认为,北京的空间秩序在民国时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国家的主导下,地方市政机构实施了一系列现代化的市政工程,如开辟公园、兴建道路、发展现代交通等。这些工程往往以公共福利为名义,但实际上常常只是为上层市民服务,城市内部空间的多元性与异质性在比较广的范围内存在。现代化工程导致了新的按等级划分的空间组织方式、新形式的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城市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孕育了新的空间区隔。作者还重点探讨了民国北京不同消费空间与市场等级的对应关系,众多新消费空间的兴起以及与之匹配的消费行为不仅是城市阶层分化的外在表现,更参与了各阶层对自身社会等级与社会身份的构建与塑造。<sup>②</sup>

王亚男的博士论文关注的是20世纪上半期北京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建设的实践,尤其是对城市规划理念、活动对原有城市空间结构、社会结构、土地利用模式、城市管理模式等方面的改变进行了重点评析。具体在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方面,王亚男的观察与董玥有很多类似的方面。她从作为物质实体的空间以及非物质实体的社会空间结构两方面分析北京,前者表现为从封闭到开放、传统皇权空间的市民化、商业性空间的增长等;后者表现为从“满汉殄域”模式的消失过渡到以职业分工为基础、以经济地位为主导的社会分化。<sup>③</sup>

程为坤主要从城市公共空间的角度考察了清末民初北京普通女性的生活经验。作者认为,女性的日常生活和挣扎是北京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初北京城市公共空间的增长为女性带来了自由度的增加,他们进入到这一空间中,利用大杂院、街道、庙会、戏园、妓院等发展社会网络,找工作或找乐子,倾向于将公共空间根据自己的需要改造成日常的生活空间,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展示出主体性的力量,但同时也为寻找生活的这种意义而付出了代价。<sup>④</sup>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马钊新近出版的著作中也重点探讨了民国中后期北京城市空间与女性的日常生活,如逃婚、诱拐等,以及北京与周边区域的交通网络问题。<sup>⑤</sup>

市场作为一个特定的消费空间,如果从区位分布、消费模式、目标人群等方面考察,实际上牵涉到更广泛的内容。高松凡探讨了自元代至民国时期北京城市市场的发展变迁,分析了历代北京城市市场空间分布的形成演变及影响市场区位的主要因素。<sup>⑥</sup> 王建伟也探讨了消费空间问题,但更关注的是城市空间重构背后新的等级关系的划分。他不仅将王府井与天桥视为重要的城市空间与商品交易场所,更视为两种差异巨大的城市景观。王府井大街与天桥地区代表不同的商业形态,同时也是城市风貌与社会

① 孙冬虎、王均《民国北京(北平)城市形态与功能演变》,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② 参见董玥《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三联书店2014年版。季剑青撰写了该书书评《民国北京的现代经验》,发表在《读书》2015年第2期。

③ 王亚男《1900—1949年北京的城市规划与建设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④ 程为坤《劳作的女人:20世纪初北京的城市空间和底层女性的日常生活》,杨可译,三联书店2015年版。

⑤ ZHAO MA Runaway Wives, *Urban Crimes and Survival Tactics in Wartime Beijing, 1937-1949*,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5.

⑥ 高松凡《历史上北京城市市场变迁及其区位研究》,《地理学报》第44卷第2期,1989年6月。

生活的典型展示。不同的空间内部,分布着类型不同、等级不同的商品经营者以及面目不同、阶层不同的各种消费人群。王府井与天桥的差异并不仅仅是两个商业街区、两种商业模式或城市景观的差异,背后折射的是民国北京城市化进程中的巨大鸿沟以及社会阶层的割裂感。<sup>①</sup>正如陈平原曾论述的那样,以胡同为代表的老北京与以大院为代表的新北京,存在着裂缝;紫禁城的皇家政治与宣南的士大夫文化之间,也有巨大的差异,王公贵族与平民百姓并不分享共同的城市记忆。<sup>②</sup>

葛以嘉研究了戏剧的表演空间从清末北京的茶园到民国的剧场按照西方模式被加以改造的转变过程,关注的焦点并非舞台上的戏剧,而是在舞台之外社会角色的表演,以及演员与观众之间的关系。她认为,从帝国转型到民族国家这个基本政治结构上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20世纪指导日常社会与政治实践的根本原则的变化,也都表现在茶园和剧场这个微缩的世界里,表现在其空间安排和对观众行为的期待上。与公园、广场、运动场以及其他与现代国家建设相关的空间一样,新式剧院既是脱离了旧等级的解放了的空间,也是规范和重组社会从而为新目标服务的一种工具。<sup>③</sup>

作为妓女、妓院集中之地,八大胡同地处北京繁华闹市,与众多商业、娱乐设施毗邻,在清代和民国时期北京城的空间结构中具有特殊的符号意义。熊远报以清代和民国时期北京的妓院为例证,探讨了八大胡同与近代北京城的空间关系。作者指出,八大胡同周边区域是一个全国性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信息中心,是一个充满各种商业机会、政治机运的特殊区域。从这个意义上说,妓女与妓院承担了多样性的社会功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sup>④</sup>

街道格局的演变是城市空间变革的重要内容。民国初年,在北京城的改造中,南、北新华街的开辟是重要案例,具有重要的政治、社会意义。新华街与一些配套工程尤其是新的南城香厂“模范区”的结合,形成了一个崭新的城市街区系统,这个街区系统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王朝时代之城市空间的格局,几近成为北京城市现代化的先驱。不过,由于时代的动荡不定,特别是首都的南迁,新华街—香厂街区的发展未能持久,最终走向衰落。新华街计划的实践,为认识近代北京城市形态及空间结构的变局,提供了重要的观察点。唐晓峰与张龙凤对近代北京新华街改造这一个案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察与阐述。<sup>⑤</sup>

相对于具体的“物理空间”,姜涛探讨的是非物质意义上的“文化空间”,他梳理了1920年代初期沈从文从湘西到北京,在一个陌生的生活秩序、文化秩序中,苦苦寻求自身生存的一席之地,最终进入北京新兴的文化空间的历史过程。在社会流动的更替、都市文化格局的重构、人际网络的转变、社会位置的制约等层面,沈从文的这种经历并非孤立和偶然,而是凝聚了某种集体性的历史经验。对于这一群体而言,城市不仅是实体性的存在,同时也是一个象征性的空间,代表了一种新的人际网络、一种新的身份意识,暗含了一个人如何摆脱原来的社会网络,如何参与动荡的现代历史,如何在一种城市特定的空间关系中安置自我,获得一种新的身份认同的问题。<sup>⑥</sup>

此外,近两年有两篇博士论文主要从“空间”维度探讨近代北京的历史进程,值得关注。20世纪

① 王建伟《王府井与天桥:民国北京的双面叙事》,《学术月刊》2016年第12期。有关北京城市消费的深入论述还可参见许慧琦《故都新貌:迁都后到抗战前的北平城市消费(1928—1937)》,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2008年版。该书以城市消费的发展为主轴,审视了北平从迁都之后到抗战之前(1928—1937)发生的各种新变化,包括政军情势、人口结构、商业趋势、文化资源、消费主力、妇女职业、市民娱乐、市府规范等。

② 陈平原《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③ 葛以嘉《从茶园到剧场:作为社会文本的20世纪早期中国戏园》,董玥主编《走出区域研究——西方中国近代史论集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④ 熊远报《八大胡同与北京城的空间关系:以清代和民国时期北京的妓院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1期。

⑤ 唐晓峰《新华街:民国北京城改造个案述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1卷第3辑,2016年7月。

⑥ 姜涛《从会馆到公寓:空间转移中的文学认同——沈从文早年经历的社会学再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3期。

初,现代公园的出现及其命运变迁也是观察北京城市空间变革的重要载体,林峥认为,公园作为西方现代都市文明的象征被提倡,与北京的都市改革与市政理念密不可分。北京公园的独特性在于它不是照搬西式,而是改造清朝遗留的园林坛庙,因此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它既是最新的都市公共空间,也是最旧的封建皇家遗迹。从这个角度上说,公园具体而微地象征了同期北京的时代特征。<sup>①</sup>王谦以帝都、国都、故都的身份变化为节点,考察传统的政治制度、文化观念与外来的现代化力量在近代北京的碰撞过程及其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sup>②</sup>

从整体而言,现有研究或把“空间”作为具体的探讨对象,或把“空间”作为研究维度,对近代北京空间结构的演变过程及一般规律进行了基本梳理,对公园、广场、商场、街区、城墙等领域也进行了微观考察,对于一些个案的细节描述已经比较扎实与充分。从学科特点而言,历史学关注时间,地理学关注空间。近几十年来,两者相互渗透的趋势日益明显,体现在城市史研究中,呈现出更加立体与饱满的社会场景。下一阶段,需要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总结与提炼有关近代北京空间结构演变的相关理论问题,如影响空间变迁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力量是哪些?其内在机制、动力及特征是什么?空间结构演变背后的政治变动、技术应用与社会阶层重构等内容也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 二、近代北京空间结构演变的基本脉络与特征

每座城市都有特定的空间形态,空间结构与城市身份、功能定位以及地理条件等因素密切相关。对于北京而言,自元代始就成为全国性都城,政治属性十分浓厚,政治因素几乎渗入每一处领域,城市内部的方方面面无不印证着这种痕迹。尤其到了明清时期,这种空间特征更加明显。从空间视角考察,作为“帝都”的北京城是帝王权力的物质载体,皇权是城市运转的核心动力,政治是城市运转的核心功能,由此导致各类建筑在城市格局中都有特定的位置分布与意涵。城市内部的空间秩序、城市规划以及建筑形式都在宣扬“皇权”的唯我独尊,皇宫、衙署、坛庙等政治属性突出的建筑奠定了城市景观的基础,并决定着北京城的空间布局。以贯穿南北的纵向中轴线为基准,不仅形成了稳固的两边对称结构,而且显示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美学特征。宫城、皇城、内城、外城四重城墙的空间界限不仅是一种地理界限,也是对社会等级与阶层身份的规定与划分,并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在这种空间结构下,历代帝制政权都对北京实行严格的空间管制。清朝建都北京后,内城成为满清贵族、官员以及满蒙汉三军八旗的专属居留地,原有的汉族及其它民族被强迫迁往外城或其它地方,以层层城墙为界,实行“旗、民分治”,界限分明。通过这种方式,北京内城逐渐形成以紫禁城为中心,中央衙署为前导、八旗劲旅环卫的封闭性政治、军事结合体,相当于一座戒备森严的军事大本营,居民生活受到严格限制。

进入清代后期,皇权逐渐式微,政府控制能力下降,很多制度有名无实,内城逐渐出现一些商品市场,外城居民开始进入内城,流动性明显增强,管理松动,内外城界限逐渐被打破,城市的商业、文化、娱乐、生产功能日渐发达。庚子年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城,在对城市进行严重破坏的同时,也对传统的社会心理与空间结构形成了巨大冲击。中央政府西逃,出现了暂时的权力真空,社会秩序陷入混乱。联军对北京实行分区占领与管制,京城原有的行政管理体系基本解体。为了保证北京的正常运转,维持地方治安,清庭留守官员与各国占领军协商,由各占领区的士绅出面,组成临时治安机构,协助各占领国对城市各占领区实施管理。联军撤出后,京城原有的八旗分区驻守格局发生了改变,尤其随着现代警察制度的逐渐确立以及地方警政机构的建立,北京实行分区划定管界,由内外城的双重结构逐渐转变为城市分区治理,“帝都”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以及稳固的空间结构愈发显示出崩解的先兆迹象。

<sup>①</sup> 林峥《北京公园:现代性的空间投影(1860—1937)》,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论文,2015年。

<sup>②</sup> 王谦《帝都、国都、故都:近代北京的空间政治与文化表征(1898—1937)》,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论文,2015年。

清末东交民巷使馆区出现,从原有的城市空间中切割出一处独立的“城中之国”。20世纪初期,正阳门西、正阳门东两座火车站先后建成,成为国内多条铁路总汇之处,从此出发可直达东北、华南、华东、江南,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北京城早已不是那座封闭的“军事大本营”,日益扩张的城市规模以及城市功能的变化都在很大程度上挑战着原来的空间结构。

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华民国建立,国家政体变革、最高权力更替,北京虽然延续了“国都”身份,但传统的空间结构已经随着帝制衰亡而丧失了旧有的合法性。城市形态发生根本性变化,引发社会结构变化,形成与之匹配的新的空间形态,原有的皇权至上的空间结构逐渐瓦解,政治性、神圣性逐渐淡化,世俗性逐渐凸显。

城市管理体制变革为近代北京空间结构的演变奠定了行政基础。“共和”“市政”等观念的传播,奠定了城市空间变革的思想基础。民国初年京都市政公所、京师警察厅建立后,由官方主导在北京实施了一系列市政工程。在国体发生重大变更的背景之下,作为皇权重要象征的皇城的角色与内部格局等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伴随大部分皇城城墙在20世纪20年代被拆除,皇城的边界逐渐模糊,皇城的概念逐渐混沌,皇城与北京内城的区隔逐渐被打破,城市内部的流动性明显增强。皇城由皇帝的个人私产演化为大众的公共空间,原有的皇家宫殿、坛庙、园囿等纷纷向社会开放,皇城内部的街巷格局有了新的规划,出现了一批与原有皇城完全不相关的新式建筑,一些公共文化机构在此建立,普通居民也开始生活在曾经的皇家禁地。以皇城的解体为标志,帝都北京艰难开启了近代市政化的进程。这种对城市空间格局的改造也体现出全新的政治理念,皇权的影响逐渐远去,城市建设回归到以人为核心,政治制度的变革痕迹通过空间变革表现出来。

近代北京空间形态的重要变化主要是由皇城的功能转化、城墙的拆毁、新式街区的修建等因素所促发。正阳门实施改造、和平门修建,南、北新华街开辟,并与香厂“模范区”结合,形成了一个崭新的城市街区系统,成为近代北京空间变革中的标志性事件。一批西式风格新建筑(如教堂、学校、银行、洋行、工厂、官署、商场等)出现,丰富了城市景观体系,同时也更加映衬出城市内部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不过,与上海、汉口、天津、青岛等当时近代化程度较高的口岸城市相比,这些新建筑成“点”状零落分布在城市之中,对传统的空间布局以及整体风貌的改变幅度有限。作为长期的“帝都”,受传统礼制以及地理条件的影响,明清北京城的总体布局形式非常稳固,以中轴线为基准确立的两边对称的空间结构构成了一套非常平衡、严谨、方正的体系,不会被其它力量轻易撼动。另一方面,这也与北京近代化程度发育迟缓、动力不足密切相关。

新式交通工具的出现对城市原有格局形成了挑战。有轨电车、公共汽车、环城铁路路线的设置,都遭遇了以城墙、城门、牌楼为代表的传统城市格局的阻碍。通过拆除城墙、牌楼等,对于原有的由城墙围合的封闭结构形成冲击,在便利市民的同时,也是对城市原有社会秩序的改造。与建立在政治因素、血缘因素基础上的僵化的传统等级制度相比,新的等级体系展现了其灵活的一面。总体而言,在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双重主导下,城市空间实现了新的划分,但内部壁垒仍然顽固。

沦陷时期,北京成为日军在华北推行殖民统治的中枢城市,城市形态、功能与空间结构也发生了相应变化。日伪政府制定了《北京都市计划大纲》,应用西方城市分区理论,将北京市域划分为不同类别的功能区,这是对近代北京第一次进行全面的城市规划。《大纲》中的很多内容虽然最终没有完全实施,但抛开政治因素,纯粹从技术角度考察,“西新市街”区与“东新市街”区的建设以及在长安街东西两面城垣各新辟的“启明门”(今建国门)与“长安门”(今复兴门),不仅拓展了城市的横向轴线,而且也与北京传统的地理条件相吻合。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规划思路中的部分内容不仅在北京光复后被国民政府所沿用,并在建国之后一段历史时期中持续发挥影响。因此,需要对此有更加深入的审视。沦陷时期的北京也是当前研究中非常薄弱的领域,其中有资料收集、语言等不利条件的限制,也有意识形态等一些非学术性因素的干扰。但这一时期是北京城无法绕过的部分,即使厘清一些基本史实,也有重要意义。

### 三、“空间”作为一种“方法”与“维度”

城市史研究中，“空间”最初是被视为一个物态的、客观的研究对象而对待的。进入20世纪下半期，哲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纷纷渗入，使空间问题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理论命题，“空间”突破了原有的概念边界，转换成为一种研究视角或研究维度。亨利·列斐伏尔考察了“空间”与“社会”的关系，进而提出了“空间生产”理论，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他注重从政治角度解读“空间”，“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sup>①</sup>此后，福柯、大卫·哈维等人逐渐拓展“空间”理论，前者将“空间”与“个体”的关系作为重心，讨论了“空间与统治技术”，后者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同对空间和时间的改造联系起来，认为要想夺取社会的主导权，就要掌握空间的支配权，空间于是被卷入到政治经济斗争的焦点之中。<sup>②</sup>

从这种空间维度考察，近代北京也是从一个功能单一的“政治空间”向综合性、多元化“城市空间”的过渡过程。原有皇权至上的空间结构逐渐瓦解，多重封闭的城市格局被打破。城市规模扩张，市域范围扩展，新兴商业空间兴起，人口增加，以政治功能为中心的“一极化”空间结构逐渐转化为政治与商业因素并重，经济杠杆对城市布局的调节作用不断增强，多中心化趋势发展明显。近代北京正是在对传统皇权体制控制下的空间结构的一步步挣脱中，形成了新的城市流动性，从而展示出更多的活力。

城市空间是地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有机结合，不同的空间形式内部，都有与之匹配的等级秩序与社会结构，空间结构的变化也是社会阶层重构的外在反映。近代北京社会结构变革首先表现为王朝统治阶层的没落，王权领域收缩，公共领域拓展，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世袭等级体系逐渐瓦解，新兴职业、身份、阶层的出现形成了更加宽松的社会流动性，但建立在阶层分化基础之上的空间区隔一直比较广泛存在，城市空间并未向所有人平等开放。一方面，由于不同区域之间的市政建设水平、商业设施分布等存在明显差异，城市空间内部呈现迥异的物质环境与城市意象；另一方面，不同群体与阶层依托特定的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对城市空间实现不同程度的占有与支配，各自行为取向也呈现不同的特征。总体而言，近代北京空间变革中，商业与资本力量的主导性明显提升，但传统因素以其强大惯性仍然持续发挥作用。

城市既是一种地理空间，也是一种人类社会组织，是社会关系演变的舞台。人们在创造和改变城市空间的同时，又被他们生活的空间以各种方式控制。某种空间秩序一旦形成，对于其间所要开展的活动，通常会有某种指向作用，人一旦进入其中，需要遵循既定的规范，这也是与这个空间秩序进行对话的一个过程。不同的空间形式内部，都有与之匹配的等级秩序、社会结构以及人际关系网络。空间结构变化，其它方面也会发生变化。以民国时期北京大学为例，以沙滩红楼为中心，通过不断扩建校园，并与周边的故宫博物院、北海公园、北平图书馆以及其它高校连接，形成一处新型的文化教育空间。空间内部，有操场、礼堂，教室也是开放的，学生、学人的聚集方式、行为方式、交往方式等都呈现新的特点，形成新的社会关系网络。甚至不同的居住方式形成不同的关系形态，居住在出租公寓里的学生与居住在校园宿舍的学生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思想风气，当然，这些因素不能绝对化，但并不意味着可以被忽视。

以百货商场、电影院、跳舞场、游艺场等为代表的新兴消费空间出现之后，不仅形成了与之匹配的都市文化形态，而且参与了社会等级体系的再建构。这些场所与传统的庙会、茶楼、戏园混杂分布在城市各处，构成多元的城市消费空间。不同空间内部的运行模式不同，欣赏习惯迥异，覆盖不同的目标群

<sup>①</sup>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政治学的反思》，包亚明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

<sup>②</sup> 关于列斐伏尔、福柯、大卫·哈维等人的“空间”论述，可参见汪民安《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1期。

体,对于消费空间的选择并非单纯的消费方式问题,背后隐含着社会身份、经济地位以及日常审美等多个层面的差异,这些内容既是对自身所处社会阶层的一种反映,同时也是对自身所属社会身份的一种塑造。

与其它城市不同,近代北京的公共空间大多是通过改造原有皇家建筑的改造而实现功能转换,如广场、公园、博物馆等,因此也呈现出鲜明特征。由于城市厚重的政治文化传统,国家意志仍然在这些公共空间中发挥重要影响。美籍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曾论述现代建筑空间如何影响人的意识:“建筑空间一直在清晰地表现社会秩序,只是可能没有过去那样张扬和僵化。现代建筑环境甚至保持了教育的功能,它的符号有通知和劝诫的作用。建筑持续对各种感觉和感受施加直接的影响,所设计的基本特征,例如密封和敞开、垂直性与水平性、质量、体积、室内的宽敞性和光源等,都会使身体一如既往地做出反应。依靠技术,建筑通过创造新形式或者以至今未曾尝试过的规模重组旧形式持续扩大人类空间意识的范围。”<sup>①</sup>

公共空间中的国家、社会组织、群体与个人的关系应该是很有潜力的研究领域,尤其在北京这样一个具有特殊身份的城市中,特定空间内部的各种活动牵涉出非常广泛的内容。以天安门广场为例,虽然通过改造打破了旧时皇家庙堂的封闭模式,逐渐演变成为群众集会的公共广场,但国家权力并未对此完全放任,而是一直实施社会控制。“五四”学生游行背后的组织模式是什么?展现了什么样的社会心理?一个新的政权建立之后,往往通过对空间的控制来达到巩固和强化政权的目的。南京国民政府接管北平后,短期内连续多日在天安门广场举办北伐庆祝大会,重写胜利者的历史,塑造胜利者的形象,宣扬其意识形态。以公园为例,官方在提供市民休息、游乐场所的同时,也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赋予公园社会教化等很多附加功能,如国家观念的培育、公民意识的养成、卫生习惯的示范、公共秩序的强调等。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的建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新政权建立新的国家认同、启蒙民智的努力。此外,民国初年北京地方市政机构对城市空间结构的改造,也蕴含着新生政权向民众传递一种崭新意识形态的意图与诉求。

“国都”是城市的一种特殊形态,相对于其它城市,北京的空间秩序具有更强的稳固性与生命力,政治因素以及传统文化观念在很长历史时期内一直发挥作用,因此,其近代转型过程也更艰难。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推动近代北京空间变革的根本性因素是什么?动力机制是什么?遭遇了哪些力量的控制与支配?空间形态的演变遵循何种逻辑?反映了什么样的政治环境、经济结构、文化传统与社会心理?

城市空间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是集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于一身的综合体,需要多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尤其面对近代北京复杂纷繁的历史场景,在历史学基础上,需要兼顾地理学、社会学等其它学科方法,适当运用社会科学化的研究模式,以社会科学的新方法作为史料解读的新手段,增加城市史研究的空间感与视觉性,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提炼、丰富、拓展、深化。

近代北京的空间秩序经历了复杂而深刻的巨大变化,应该首先聚焦于物质意义上的空间,如街道、广场、使馆区、火车站、公园、学校、寺庙、商场、电影院、戏园等,依据不同时期的城市地图,结合相关文献记载与现存遗迹,通过确定地理方位,分析近代北京行政空间、宗教空间、商业空间、教育空间等分布的一般规律。再结合相关政治、文化语境,考察特定的历史事件与不同的文化传统作用于物质空间的影响。

对于近代北京空间变革的研究需要有效兼顾内向视野与外向视野。内向视野聚焦近代北京城市形态、行政管理体制、市政建设、社会结构变动、人口流动等因素与空间变革之间的互动关系;外向视野关注北京城与周边地区的地缘关系与横向联系,关注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往来和互动,尤其是将近代北京放置在华北区域这一框架之内去考量,城市空间也将因此得到进一步延伸。北京在华北交通体系中居于核心位置,整个华北地区的陆路交通线均指向北京,尤其是铁路兴起之后,北京的区位优势得到进

① [美]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王志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4页。



一步强化。同时,由于处于华北平原与蒙古高原交界处,北京也是中原地区通向西北地区的必经之路。一般而言,城市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并存于一定的区域范围或城市群之中。近代北京城市史研究需要冲破囿于城墙之内的偏狭意识,应对郊区、邻近地区予以更多关注,尤其是北京与周边的地缘关系。只有将城市放在一个更广阔的区域视野中,才能在彼此的联系与对照中得出更加深刻的结论。

近代北京城市空间结构演变进程中,交织着政治权利、市政技术、经济资本、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碰撞与博弈。空间结构与城市形态、城市功能、外部环境、发展路径等因素息息相关,空间感是城市研究的基本观察点,也是历史学者相对比较缺失的部分。对空间问题的考察提供了审视近代北京政治、文化与社会变迁的一扇窗口,显示出北京作为传统政治型城市的特有转型之路,对于继续深化北京城市史及周边区域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从现实层面来说,近代北京空间结构的演变与城市化进程相伴始终,至今仍在延续。今日北京相比于100年前,各个方面都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复杂性远非昔日可比,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如市域空间拓展、空间功能分区等方面,不同时代仍然具有共性特征,现有城市格局也是在原有空间结构基础上逐渐演变而来。通过对空间问题的考察,找寻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当代北京城市发展进程中诸多矛盾产生的历史根源,检讨城市规划与功能定位的得与失。对于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合理优化空间布局,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101)

(责任编辑:张燕清)